

再读《语法修辞讲话》

摘要:《语法修辞讲话》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但是对其意义的探讨却不应被束缚在政治层面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成果的总结和整体编写体例的述评上。本文首先指出了上述前人研究内容的局限,然后就此书的体例内部架构所贯穿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在现代汉语语言学语法研究历史上的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同时结合具体实例指出了《语法修辞讲话》一书的编写对于后世编纂语言学专业研究书籍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语法修辞讲话》 语言学史 汉语研究

一、 引言

距离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¹已经过去了一个完整的甲子年,但这 69 年间,我们虽然始终在享受这一现代汉语普通话(主要侧重于书面语)的语法规范工作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民素质提高等各种便利,但是对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意义却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忽视,至少远远不及谈论其实践意义那么广袤而深刻。事实上,以《讲话》为代表的建国后 10 余年间的一系列语言研究工作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归类为“语言规范”工作的一部分,对这一要点的过分强调也影响了我们更加全面的看待《讲话》的历史意义——它并不仅仅是作为匡谬正俗的指导性文件,而且自身也上承解放前汉语语法研究的精华性成果,下启国内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讲话》原本是应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先生的座谈会指示(毛泽东主席的授意)、1951 年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精神而在《人民日报》上开始连载的,这一诞生背景也明确地昭示了《讲话》的直接目的,即“为人民服务”,让语言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应用语言学知识来合理地纠正当时广泛存在的语言使用混乱现象,但同时这也在无形中束缚了后世学者对其发表意义的解读,他们主要从文章体例、语言变化所导致的分析不适用以及实践效果等角度进行阐释。在《讲话》发表后 40 年内,由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并未再有学者就其中存

¹ 为求简洁,以下均简称为《讲话》,不再赘述。

在的问题、实际发挥的作用等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性地梳理和探讨。直到 20 世纪末, 胡双宝(1991)²概述了《讲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并就其体例进行了初步分析, 并指出建国后发表的侧重于应用的汉语语法研究论著是“《讲话》的支派或发展”, 语言规范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为语言本身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因此语言规范化工作也应紧跟其步伐。朱景松(1995)³从汉语规范化的实用角度出发, 在承认“语言是不断变化的”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定量地统计并逐条分析了《讲话》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语病和改正方法, 得出《讲话》中提到的语病纠正即便经历了 30 年的洗礼, 依然有 89%是符合 90 年代的汉语普通话发展情况的, 由此可见, 二位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的国家通用书面语语法规规范工作获得了开创性的成功, 这对于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状态下各行各业需要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工作者而言意义重大; 同时朱氏也细细指出《讲话》中对个别语言问题指摘的失当之处, 并汇集整理作以反思。杨海明(1997)⁴就《讲话》在 1979 年的再版与原版进行比对, 总结了两者在用例和分析上的差异, 并提出, 汉语在兼类词、简称、动宾结构、语言模糊度等方面的变化对语言规范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杨氏的分析依然没有逃脱探究《讲话》实践意义的框架。安红岩(1998)⁵沿循《讲话》“重点实用”的突出特征, 又接着指明此书在分析调理上的特点, 一是将语法与修辞、逻辑相结合来对语言的不规范现象进行纠正, 二是从分析具体病句入手, 解释说明语法现象, 同时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这两点的现实实用意义。21 世纪以来, 围绕《讲话》进行的著书立说并不算多, 但学者们广泛开始从此书对语言普及、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的意义的角度进行批判式阅读。段曹林(2011)⁶通过分析《讲话》的体例和“受众友好型”的编写语言特征, 挖掘了《讲话》对语言分析、消极修辞研究和专业知识科普工作的有益启示。张春泉(2011)⁷着眼于语法、逻辑、修辞之间的宏观关系, 以《讲话》为例进行了简单分析。马庆株(2011)⁸从学科联系的角度肯定了《讲话》体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张伯江、

² 胡双宝. 重读《语法修辞讲话》[J]. 语文建设, 1991(06):4-5.

³ 朱景松. 汉语规范化的成功实践——重读《语法修辞讲话》[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04):33-39.

⁴ 杨海明. 从《语法修辞讲话》看汉语的发展与规范[J]. 语文建设, 1997(12):10-12.

⁵ 安红岩. 匡谬正俗的《语法修辞讲话》[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1998(03):88-90.

⁶ 段曹林. 《语法修辞讲话》的启示[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5):21-23.

⁷ 张春泉. 从《语法修辞讲话》看修辞、逻辑和语法的关系[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1(5):20-21.

⁸ 马庆株. 结构语义表达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为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 60 周年而作[J].

郭继懋(2011)⁹则高度赞扬了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在编写《讲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以上研究都强调《讲话》的对语言实践的指导意义,对《讲话》的诞生条件也仅仅发掘了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这种研究视域忽视了两点要点:1.

《讲话》不仅对后世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而且对于汉语语法书籍的编写体例也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它的文章架构与解放前“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早期汉语语法研究科普读物有着明显的分野,可见,后世著书立说的术语使用和编写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讲话》中的内容,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只是泛泛地谈《讲话》对后世的意义,则只能浮于表面。2.《讲话》的出现符合我国一脉相承的语言学研究的学科内部发展规律。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¹⁰,因此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语言学研究都只着重于训诂学、文字学以及稍稍后起的音韵学,真正对语法发起研究始自清朝。特别是清末,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一批批学者们从海外归国,并带来大量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为传统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汉语的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兴起到发展的成长阶段,《讲话》便是汉语语法研究借助现代语言学研究范式走向科学、客观、实证的一次集大成贡献。同时,由于《讲话》以白话文书面语为研究对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际的语言病例来将理论渗透其中,完全打破了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前文言书面语仅少数人、统治阶级掌控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原本的精英阶层面向人民群众所做出的一次最大诚意的彻底的放权,而这种历史意义的赋予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对人民受教育权的完全的、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二、《语法修辞讲话》的体例

《讲话》采取“以点带面、穿针引线”的思路来组建整体的语病问题讨论和分析。第一讲首先逐一举例定义语法学的基本术语,这一步骤帮助人民群众塑造起对言语聚合群的基本认知,然后按照字、词、句、段这样由小到大、由

世界文化, 2011.

⁹ 张伯江, 郭继懋. 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谈吕叔湘先生的社会责任感[J]. 世界文化, 2011(12):10005-10006.

¹⁰ 王力. 王力全集,中国语言学史[M]. 中华书局, 2013.

部分到整体的成篇过程来阐述各个聚合群之间的组合规则。这样的安排无疑是非常考究且合理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符号性,作为语言的符号则是音义结合体,言语则是语言的具象表现,言语的组配成句是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双向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在首讲就先把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储备知识传输给受众,有了这些分析工具,才能顺利地进行后续的具体展开工作。接下来从第二讲一直到第五讲,都是从不同的聚合单位或组合结构出发,通过正反例相结合(由于纠正语病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到非专业人士是否易懂这一问题,此书中出现的多为反例,即存在语病的句子)的方式来剖析语病问题。

依循第一讲中的出现顺序,接下来的第二讲和第三讲都属于词汇范畴,在具体安排上,先实词,再虚词,这不仅符合人类早期语言中各种词汇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同时也符合人们一般接触新事物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学习顺序,虚词往往由实词虚化而来,不像实词那样具有实际的词汇意义,但又在句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语法作用,所以对于汉语而言,解决了虚词,汉语语法问题就几乎解决了大半。因此事实上,在虚词这一讲中,已经代入了语法分析的概念,并开始从词法转向句法,最终完成整套语法解说的任务。第三讲中的虚词语法讲解中,又从语法功能与最易被人所感知的名词最接近的代词出发,谈到数量关系、比较关系用词,然后是语法功能多样的“的”,再到并列关系连词“和、跟、同、与、及、并”,这几者之间并不是我们想当然认为的可以完全同义替换的关系,他们在语体色彩、词的兼类问题上存在诸多的不同;接着进入到完全的与动词密切相关的虚词部分,如动词的进行体标记“着”、完成体标记“了”,被动标记“被”、处置式标记“把”,相关性锚定标记“对于、关于”,时间位置引介词“在、从、当”,句子或短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连词“因为、为了、由于、结果、使”,涉及否定和疑问的虚词和文言虚词等。相关性锚定标记等某些在上述被归为与动词有关的虚词这一类别中,是因为在语义学上,动词的辖属范围可以统摄全句,因为任何一个句子中出现的成分都是为了补充说明动词所表示动作或状态的详细信息,如施事、受事、与事、主事、工具等多种语义角色,可见吕朱二老在虚词这一讲的逻辑安排是非常清晰且有条理的。

从词进入到句子,这是简单句成句的最后关键一步,在这一步当中,我们

需要知道对于汉语的句子而言,最必不可少的到底是什么成分,实词的词类划分又是否可以直接对应句子当中不同的语法成分。吕朱在这一讲首先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对于汉语而言,句子的主干成分只有两种,“主——谓——宾”和“主——表”,其他的附加语都是枝干。这一解读表面上看似似乎不太符合汉语的实际,因为就汉语而言,实际上只有单纯的动词也可成句,特别是用在口语对话中回答别人的问题,尤其是“是非问”类型的问句,比如,“-小王在宿舍吗?”“-在。”这样简明的回答是汉语经济性的一大体现,但是此书中并未罗列这种类型的句子主干形式。这是因为本书主要针对的是书面语而非口语的规范工作(口语的规范远远不及书面语的规范重要,因为口语交际的即时性、瞬时性和灵活性非常强,出现轻微的不符合语法的倒装、置换、修饰逻辑错误等问题,可以自己自发的做出纠正,甚至如果不妨碍理解,即使不纠正也完全可以;但是书面语往往会流传下来,一经书写就难以改动,并且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新生的汉语习得者的用语习惯,如果汉语书面语混乱不堪,将会对国家通用语带来持续且严重的危害,因此此书纠正语病的定位对象就是书面语,而非口语),书面语一般表意较为复杂且完整,因为它丧失了口语交际中表情、手势等辅助交际工具,在相当情况下需要用更多的词汇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来传达更加准确的含义;最重要的是,对于汉语语病的纠正,抓住主干部分,再理清枝叶部分,就能迅速地发现错误从而知道整句是否有主干部分的缺失、是否存在搭配不当等问题从而做出适当的修正。而对“实词的词类划分又是否可以直接对应句子当中不同的语法成分”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诚然这是嫁接第二、三讲与第四讲之间的桥梁,但却仅仅是汉语研究者应当详细探讨的内容,而非纯粹的语言使用者应当解决的事项,强行加入这一部分的内容反而会使原本已经简化的问题复杂化,这绝对违背了吕朱二老的本意,因此并未在第四讲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第五讲和第六讲别出心裁,分别从读者理解和文本生成中的标点符号的使用的角度来探讨“怎么写是错的”,而第二讲到第四讲多是从语言形式出发来解读这一问题。从书面语书写的主体到书写的受众,再到近现代出现并最终确立起的汉语文章体式中非常重要的标点符号,作者的讲解可谓面面俱到,一丝不苟,高质量地完成了汉语书面语规范化任务。而前人在评述此书体例时,多停

留在章节之间的宏观联系上,殊不知章节内部也同样是经过精心打磨才亮相的。没有挖掘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真正领会老一辈学人在做科普工作时的匠心,也就无法吸取前辈的经验和智慧并传承下来。

三、《语法修辞讲话》的语言学史意义

《讲话》最早于1951年连载在《人民日报》上,针对解放后新中国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状况,以指导普通群众把“祖国的语言”“用得正确”为目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¹¹。这一突出的特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对其价值的评判角度,迄今为止学者们多从语言和语言学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对于我国语言学史的梳理依然是较为落后的,只有零星的一两本史论著作,并且并未脱离王力自先秦至解放前夕的史纲范式,对于建国后的语言学发展状况也许由于时间距离太近,反而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谈论的内容既浅显又概括(这也许是“尚古”之风的遗留,我国向来有此趋向,语言学界尤甚),因此未能有学者将此书放在中国语言学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中探讨其学术意义。我们认为,《讲话》在语言学研究史中的承上启下的传承开辟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我国虽然很早就有了训诂学、文字学,但是受到汉语汉字自身特点的影响,真正的语法学研究,也即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则肇始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王力曾将解放前的语法学研究分成两个时期,兴起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马建忠、杨树达和黎锦熙;发展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他进行史纲划分时《讲话》还没有发表,固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是整体的划分思路现在看来依然是合理的。首先是以马建忠为代表的兴起时期,这段时期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主要有《马氏文通》、《国文法草创》(陈承泽)、《高等国文法》(杨树达)、《词诠》(杨树达)、《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比较文法》(黎锦熙)等,由于现代语言学属于舶来品,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理论上均借鉴自西方,因此兴起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笼罩着浓重的欧式语法的影子,并未能真正勘破英语语法从而灵活和辨证地看待汉语语法,某些地方往往过于执拗于印欧语系的语法框架,这一局面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诚然,人们认识新事物之初总是会倾向于拿它与已知的事物进行比对,从而对它

¹¹ 段曹林.《语法修辞讲话》的启示[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21-23.

做出定位,在这一点上,我们 also 无需过多苛责古人。但是这同时也启示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应以差异作为判断语言优劣的依据,每一种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都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对于这一点,吕叔湘先生曾经有过非常经典的表述:“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可是啊,习惯于那种语法的人又会觉得汉语的语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那么,究竟哪种语法好些呢?这很难说了。一方面,任何语言都必得有足够的语法才能应付实际需要,无非是有的采取这种方式多点儿,那种方式少点儿,有的恰好相反罢了。因此,从原则上说语法难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着“左撇子”不顺眼。……可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只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许多语法规则还没有归纳出来,并且可能还不太容易归纳出来。这就似乎又不如那种以形态为主的语法,把所有的麻烦都摆在面子上,尽管门禁森严,可是进门之后行动倒比较自由了¹²。”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的精华部分的确被后世所承继,比如,《讲话》的章节体例虽然是面向普通群众的目标指向,并因此采用“先理论、再实践”的思路架构全部内容,但这一安排也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脉相承,《马氏文通》同样采取了类似的章节结构:首先对语法术语进行定义“界说”,然后按照实词——虚词——句读的顺序逐一阐述分论要点。这种节奏前后安排甚至到今日依然顺延,比如国内各高校不同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大致都是按照“总论——词——句——篇章——修辞——标点符号”的顺序进行编写的(由于文字和语言分属两个系统,语言先起,文字后起,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因此关于文字的章节可以灵活地穿插其中,并不会扰乱总体的编写模式)。从客观上来说,这也确实符合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顺序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本思路。这一时期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黎锦熙的语言学研究,他的语法研究著作主要发表在白话文运动之后,因此其所著内容均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以文言文语法为研究对象的《马氏文通》。

到了我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时期,王力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照搬西洋语法来研究汉语,主张“要从客观材料中概括出语言的结构规律,而不是从某些

¹² 胡明扬. 语文学习往事谈[J]. 语文世界(高中版), 2005(Z1):6-8.

先验的语法规则中审查汉语。¹³”这无疑是相当重大的进步——不厚古薄今，不顾此失彼。基于这一先进的语法研究思想，王力还在《中国语文概论》、《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详细讨论了句子的分类和句子成分等内容。王力这种重视汉语自身特点的治学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吕叔湘则在 1941 年出版《中国文法要略》，此书从语言表达内容写到语言表达形式，其实后者已经基本属于修辞和表达技巧、表现手法方面的内容了，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研究方法，王力也曾对此表示过高度赞扬。事实上，吕朱二人的《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种编排思路，从语言理论到语言内容再到语言形式，逐渐拓宽语言规范工作的辖域，并从多个角度切入，全方位地照顾到了语言表达各个层面所可能出现的语病问题。

可见，《讲话》对解放前我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借鉴是多方面的，将多个层级的研究成果最终汇总到一起，它不仅是汉语规范化心血的结晶，更是对早期语法研究精华的吸收、创造和再运用，并深深影响了后世对语言学进行专业研究时对汉语语法研究教材的编纂。

四、 结语

对《讲话》进行语言实践意义的探讨由来已久，但鲜少有人从语言学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总结。通过对《讲话》行文体例和学科内史学意义的深入剖析和挖掘，我们发现，它远不仅仅是对现代汉语普通话国家通用语做出规范和指导的开山之作，更是承继了从清末到建国这段时间的语法研究范式，它有着同时期著作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比如未能完全突破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框架，彻底地建立汉语自己的研究范式（但是事实上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将近 70 年的发展依然没有实现这一美好愿景），但是他也同时做到了先贤们所未尽的事业，比如在历史语言学研究视角下审视共时层面的普通语言学语法研究，并对改革开放后的语言学专业研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 [1] 林有苗. 吕叔湘:心中装着读者的人民语言学家[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003(006):86-91.

¹³ 王力. 王力全集,中国语言学史[M]. 中华书局, 2013.

- [2]王力. 王力全集,中国语言学史[M]. 中华书局, 2013.
- [3]张伯江, 郭继懋. 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谈吕叔湘先生的社会责任感[J]. 世界文化, 2011(12):I0005-I0006.
- [4]马庆株. 结构语义表达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为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 60 周年而作[J]. 世界文化, 2011.
- [5]张春泉. 从《语法修辞讲话》看修辞、逻辑和语法的关系[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1(5):20-21.
- [6]段曹林. 《语法修辞讲话》的启示[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5):21-23.
- [7]安红岩. 匡谬正俗的《语法修辞讲话》[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1998(03):88-90.
- [8]杨海明. 从《语法修辞讲话》看汉语的发展与规范[J]. 语文建设, 1997(12):10-12.
- [9]朱景松. 汉语规范化的成功实践——重读《语法修辞讲话》[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04):33-39.
- [10]张汉清, 郝金洲. “吕叔湘”的由来[J]. 语文学习, 1995(9):17-17.
- [11]胡双宝. 重读《语法修辞讲话》[J]. 语文建设, 1991(06):4-5.
- [12]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开明书店, 1952.
- [13]赵振铎. 中国语言学史[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4]胡明扬. 语文学习往事谈[J]. 语文世界, 2005(Z1):6-8.